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6 中国社会年报/高士荣,李俊彦编选.—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1

(年报丛书)

ISBN 7-311-02721-7

2... . 高... 李... . 社会问题—概况—
中国—2006—年报 . 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5068 号

2006 中国社会年报

高士荣 李俊彦 编选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电话:8912613 邮编:730000

E-mail: 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17.25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577 千字

印数:1 ~ 5000 册

ISBN7 - 311 - 02721 - 7/Z·70

定价:28.00 元

出版说明

始于 1999 年的“ 年报系列 ”丛书至今已出了第七辑，兰州大学出版社以艰辛的劳作履行了“ 年年为思想者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料库 ”的承诺。

秉承“ 浓缩信息精华，关注世象百态，梳理学术脉络，传播思想文化 ”的宗旨，“ 年报丛书 ”通过专题结构的形式把一年内那些闪耀着理论智慧、反映着实践前沿的高水平文章萃为一编，以达到集中审视广大读者所关注的各个领域发展现状和演变趋势、聚焦性记录其轨迹的目的。在年复一年的积累中，“ 年报丛书 ”日渐以鲜明的风格、系统的内容和一流的质量，成为具有强大信息辐射力的文化精品，在学界、书界和读者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2006 年版年报丛书适应读者对教育问题日益强烈的关注，在以往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世界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体育等六个专题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中国教育专题。

这样，第七辑年报丛书共分为七本，即《2006 中国政治年报》、《2006 中国经济年报》、《2006 中国社会年报》、《2006 中国文化年报》、《2006 世界政治经济年报》、《2006 军事体育年报》、《2006 中国教育年报》。

收入丛书的文章是编者从 2005 年国内公开出版发行的数千种报刊中精选出来的。这些文章的作者，既有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俊才；既有高层决策者，也有普通老百姓；既有外国知名人士，也有港澳社会贤达。被选入丛书的文章，并不一定能完全代表各位作者在有关领域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或许也不能完全反映年度内知识界对相关问题的权威阐释，但它们都传递了对这些问题的最新思考，都是视角独特、观点新颖、论证有力并具有很强可读性的好文章。

为了使文章内容更加洗练，观点更加突出，避免背景介绍方面的重复现象，编者对部分文章做了删节或摘要，有的甚至对标题也做了改动，在此恳请原文作者的谅解。因为编者和作者的目的是是一致的：传播知识，服务读者。

著名学者张卓元先生、李强先生、谷源洋先生、季羨林先生、高放先生（按姓氏笔画为序）自始至终关注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无私的帮助；许多报刊社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忱！

为表示对作者劳动的尊重，我们将向作者奉寄稿酬，恳请作者与我们联系，告知您的通讯地址。我们的联系方式是：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兰州大学出版社《年报》工作室

邮编：730000

电话（兼传真）：0931-8912613

E-mail：Zongbian@onbook.com.cn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1 月



导论

民主、法制、反腐、和谐等等，均在完成着一种特有的中国规则，在这种规则范围之中，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巨大而深刻的变革。突围也好，碰撞也好，分化也好，革命也好，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创建一个伟大中国。

编者



2 005 年中国核心议题

党内民主新探索

十六届四中全会实现的权力彻底交接无疑是2004年执政党建设的关键一环。这次全会形成的决定也昭示了未来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安全方面的政策指向。

具体而言,这些指向大概包括:权力合法性更多地强调法理性基础,以便提高权力行使的可预期性;在吸取世界各种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教训的基础上,继续包容地方党内民主方面的改革尝试,在执政系统权力的中上端,强调权力的协调和集中,以便中央政令畅通和“集中力量办大事”。

而四中全会提出的“适当扩大党政交叉任职”以及“撤并党委和政府职能相同或相近的工作部门”的决定,决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党政合一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一元化老路上去,而是在真正实现一系列党内民主进步中,既克服弊端,又能发挥优势的新型执政模式。

在2005年,我们可以期待的党内民主新探索包括: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基层党内选举、党内弹劾罢免机制等。

法治政府“十年建设”起步

2005年,中国政府将翻开建立法治政府“十年宣言”的第一章。舆论认为,中国政府正在以务实的姿态,以倒计时的心态,努力兑现“10年左右”锻造法治政府的承诺。

2004年3月22日公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颇具宣言意味:“经过10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与5年前中央政府推进依法行政的那个甚为抽象的“决定”相比,内容具体而微的“纲要”,不但是一则“宣言书”,而且是一份承诺书。自它公布于世的那天起,公民们就开始以“倒计时”的心态,以“纲要”为尺子,衡量中央政府是不是一个法治政府,有没有兑现它对民众的承诺。



2005年,中国政府将通过新的法律法规对市场进行有力的监管,同时也为自己套上了“紧箍咒”。综观15部涉及市场监管领域的法律法规的修订、制定和准备,法律界人士认为,政府正在向自己开刀。

2005年,作为这个10年建设规划的起步年,将带给我们更多的立法突破。

各级政府重分财权

行之已有10年的分税制大大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这在去年的SARS危机和今年的宏观调控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但“中央主导型”的改革取向,客观上加剧了地方治理困局。

尽管中央已经采取诸如逐步取消农业税等措施改善民生,通过法律形式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改“市管县”为“省管县”等制度性变革的呼声仍不绝于耳。由于呼声仍然存在争议并涉及到整个国家的体制,因而在2005年难有实质性的进展。但各种社会问题的压力会促使各地出台一些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措施。

首先要通过法律形式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其次,在税收立法权主要集中于中央的前提下,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第三,合理划分地方政府的级次。

如果说,上次税改主要是在税权上做文章,这次税改的核心则是较为全面的税制创新。

反腐进入深水区

深水区,意味着汪洋。腐败已不仅仅是贪污受贿,公款吃喝、购车、出国、考察等亚腐败形式日渐严重,文化已不能阻碍腐败的发生和发展,相反,“腐败文化”却正蚕食优良文化、高尚道德。

深水区,意味着不可知。深水区是无法看到底的,不知道水有多深;深水区有暗礁,但不知暗礁在何处;深水区有鲨鱼,但不知鲨鱼何时出现。进入深水区的中国腐败问题同样面临着不可知。不可知的腐败形式,不可知的腐败人物、腐败事件。如何预见、预防和监控这些不可知,是处在深水区的中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深水区,意味着不能摸着石头过河。进入深水区的中国反腐斗争,不能走一步试一步,不能哪里有石头,就跳到哪里。在深水区必须有船,有渡水的工具,深水区的反腐也需要由法制建立的反腐体系。

深水区,意味着必须有泅渡的本领。此泅渡的本领在于开明的执政心态和透明的执政方式。

2005年,在反腐的深水区里,会掀起什么样的波澜?



建立和谐社会

尽管从各项宏观指标来看,中国社会经济目前已进入近十几年来最好的时期,但却不是民众最为满意的时期。故而,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执政党在它的文件中第一次把和谐社会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尽管当一般公众将目光投注到“和谐社会”这个概念之上时,这个概念已经不是新鲜出炉,但我们若将眼光放在整个2004年,“和谐社会”确实算得上一个新概念。而它对2005年的中国走向,更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多元化利益及其纷争,构筑了出台“和谐社会”概念的背景。处于阶层逐步分化状态的中国社会,使得“和谐社会”这个概念的出现,显得殊为紧要。

诸多专家们认为,当下,制造“和谐社会”的紧要之处在于农民。在2005年,加紧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将是中国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

警惕“底线保障”扭曲

从过去一年一度春节前夕的嘘寒问暖、送米送面,到今天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广大城乡广泛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的贫困人口救助工作正在迅速向制度化迈进。这无疑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然而有迹象表明,在一些地方,以“低保”、“社保”为主要形式的底线保障已开始被扭曲、滥用。

我们不仅应对“底线保障”的滥用保持高度警惕,更应从根本上对现行制度架构与利益格局进行重新审视与调整,全面加强对经济要素的所有权、使用权等各项权益的确权与维权力度,同时大大压缩政府行政权力,对经济要素的所有权、使用权等各项权益的自由裁量与行政干预权限。唯其如此,我国数以十亿计的民众,才能以其合法取得的经济要素的各项权属为支点,共同参与分享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财富增长的福祉。

但愿在2005年社会保障带给当事人的不再是经济权益受剥夺的切肤之痛,而是社会关爱的欣慰。

疏导涌动的民意

没有网络,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民意,但有了网络之后,民意的表达有了更大的空间和更便捷的渠道。人们从网络对诸多事件的参与追问及其浩大声势中,分明感受到中国社会正在涌起一种新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它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同时,我们也要对民意的产生与影响,有着另外的观察思考。正如政府的意志并不必然是真理一样,民意也有它的盲目性,有着不可尽信的一面。民意具有情绪性,有时并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

因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民主诉求的增多而产生出来的巨大冲力,在一定时间内如突然迸发,非常可能会超过一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使一个国家陷入政治不稳定。

因此,如何将激涌的民意,控制在中国目前的国家资源可以接受的程度上,在吸收和利用民意实现政府善治的同时,又避免因民意的过度表达而冲击政府权威、引发政治冲突?这将成为2005年中国社会的一个焦点话题。

矫正“教育产业化”迷误

发展教育产业或教育产业化的本意,是指教育作为服务产业、第三产业,具有部分产业的属性,可以不同程度地引入市场竞争等市场机制,以提高教育服务的效率、质量、丰富性和多样性。然而,过去一段时间媒体关于教育产业化的激辩,早已超越了教育经济学的理论规范和学术意义,成为社情民意的强烈表达。

在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高速扩张、各级各类教育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之时,公众对教育的评价降到了近20年来的最低点。曾经被视为学术殿堂、道德源泉、至少是“清水衙门”的教育,成为舆论中的“十大暴利行业”、“五大腐败重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出的《社会蓝皮书》,又一次提供了权威的调查:子女教育费用在中国居民总消费中排在第一位,已经超过了养老和住房。

在2005年,这种愤怒的情绪会在多大程度上引发教育体制的深层次改革,并大力矫正“教育产业化”迷误,我们拭目以待。

直面生态危机

2005年的中国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生态环境?北方的沙漠化、长江流域、南水北调、甚至整个南方水域的尴尬污染、青藏高原的生态恶化、东北的黑土流失、近海污染等等,是否也将勾画出来年中国的另一面?

最近几年生态危机突出,而人们并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理方式。从生态危机到生态危害不是一步的距离,因为生态危害永远是生态危机的忠实伴侣。

除了从“人定胜天”到“天人合一”的艰难转变之路外,世人再有无选择?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让人们从改造自然的梦境中逐渐清醒。发展是必然的,自然更是无情物。世界在工业文明的诱导中抛弃了“生态文明”,在单方的辉煌中一步步陷入生态危机的泥沼。中国也未能例外,尤



其是经济发展如此迅速的今天,牺牲生态环境似乎不可避免地成了发展的代价。

2005中国生态危机并没有哗众取宠、引人争执之意,它将是所有中国人在即将来到的这一年无法回避的挑战。人们所关心的是,这场危机会以什么方式爆发出来?我们又将如何解决?

打破“重化工业”神话

临近岁末,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警告“中国经济片面重型化有危险”,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新一轮争论。其核心是“继续与重化工业共舞,还是大力发展服务业”,这是关系到整个国家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问题。

切实地地理顺和解决政府与市场、中央和地方、国企和民企、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等关系,调整 and 建立政府的指导、规范和监督机制,推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转移财政政策和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形成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多方动态一致性,完全可以使2005年的新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成为加强我党执政能力的突破口。

实际上,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对2005年的经济发展模式作出了重大调整:即大力推动消费而不是一味发展投资,优化投资结构,调整投资与消费关系,才是中国经济长久而平稳的增长之道。

跨国公司碰撞“中国规则”

2004年围绕跨国公司在华布局发出的声音和冲突,是2005年更大戏剧出台的风向标。背靠WTO规则并影响立法进程,跨国公司10年以来在华深入布局,并逐渐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秩序的强大力量。

在这一宏大进程中,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秩序的影响越来越引人注目。而在这里显现的“中国规则”,不只是现行的秩序,更关键的是真正支撑中国崛起的未来规则。在一个异常繁荣的10年之后,中国内生出一个重建内外战略平衡的要求,背后是中国主体经济力量战略失衡的危险。

而这一进程,会与中国新的政经力量试图重建国家战略平衡的努力发生碰撞。跨国公司在华的扩张,将被要求控制在某种政经框架之内。而更根本的内生矛盾则在于,单纯依赖以开放促增长、促改革的道路,最终会与真正长久推动这个国家崛起的价值和规则相冲撞。

本土企业价值重建

在告别2004年之际,创维黄宏生与中航油陈久霖,民企与国企的两个明星代表,在海外资本市场上使中国企业的价值再次蒙羞。

2004年以来,转型社会空前爆发的社会压力与大国企强势崛起的挤



压 加之跨国公司的战略深入 ,使真正本土的企业力量 ,围绕基本的生存与发展 ,被迫要同时在三个方向寻求企业价值的重建 :在全球竞争中 ,寻求突破被挤压在产业价值链低端的命运 ;在剧烈转型社会 ,寻求主流的价值认同 ;在内外突围中 ,建立清晰的商业伦理。这成为未来最重大的趋势。改革就是缔造出一幅商业成为一个国家创造力的重心的蓝图 ,企业的缔造者和强大者 ,将在中国崛起的历史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但剧烈的社会转型中所蕴含的利益与价值分裂 ,正在撕裂这个蓝本的草图。企业价值 ,陷入了危机的漩涡。

民企求变突围

宏观调控、质疑国资流失、国际贸易壁垒增加、劳资关系调整 ,后人回望2004年 ,可能从这四大事件中得出一个结论 :这一年是中国民企的调整年。问题是这样的调整到2005年是否还要进一步持续 ?

2004年 ,民企面临的原材料、能源、劳力、资金全线紧张 ,2005年是否还将持续 ,民企的生存空间会不会受到影响 ?

2004年 ,民企大规模向上游产业进军的速度显著下降 ,2005年 ,这种进军是否会完全停下来 ,这是不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

2004年 ,联想收购IBM、万向已收购20余家海外企业、华为和中兴的海外业务成为其成长的主要来源 ,诸多实业巨头纷纷把视线转向海外 ,把中国民企的高效率转移到海外去是不是一条被逼出来的可行之路 ?

历史是未来的头绪。从诸多头绪中 ,我们有可能理清中国民企2005年的走向吗 ?

(张良.南风窗 ,2005 ,1上)

2 005 年中国社会形势的基本走向

同往年一样 ,我们设计了部分题目 ,以了解领导干部对下一年中国社会形势发展趋势的看法。总体而言 ,领导干部对2005年我国改革、发



展、稳定各方面的预期是乐观的。

一、近90%的被调查者对改革、发展、稳定的前景有信心

在被调查的107位领导干部中,对今后一段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前景,15.9%的人“充满信心”,72.9%的人“比较有信心”,只有1.9%的人“信心不足”,但有9.3%的人表示“说不清”有没有信心。充满信心和比较有信心者合计,占被调查者的88.8%,这一比例还是不低的,但不如前两年,2002年和2003年均达到93%以上。

二、居民实际生活水平总体上看会“略有上升”

与2004年相比,4.7%的人估计2005年所在地区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上升很多”,61.6%的人估计会“略有上升”,26.2%的人估计会“基本持平”,6.5%的人估计会“略有下降”,只有0.9%的人估计会“下降很多”。

三、机构人事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仍然是领导干部关注的改革焦点

调查结果显示,在2005年领导干部最关注的改革中,列第一位的是机构人事制度改革(28.0%);第二位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21.5%);第三位是国有企业改革(13.1%);前几年一直居第一位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次退居到了第四位,只有12.1%的领导干部把其视为自己最关注的改革。前四位都有超过10%的领导干部把其视为自己最关注的改革。列第5~8位的依次是:医疗体制改革(8.4%)、劳动就业制度改革(7.5%)、财税金融体制改革(4.7%)、教育科技体制改革(3.7%)。没有人把住房制度改革作为自己最关注的改革。

从三项选择合计的结果来看,72.9%的领导干部关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确实,近年来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收入差距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改革焦点。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这一问题,领导干部自然也十分关注这个问题。列第2~8位的依次是:政治体制改革(45.8%)、机构人事制度改革(43.8%)、财税金融体制改革(37.4%)、国有企业改革(35.6%)、医疗体制改革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均为20.6%)、教育科技体制改革(13.0%)和住房制度改革(5.6%)。

与前几年调查结果相比,领导干部最关注的体制改革的排序,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四、保持社会稳定和强化宏观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顺利推进改革的最主要决定性因素



在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顺利推进将取决于哪些重要因素的调查结果见表1。问卷提供了10个封闭式选项和1个开放式选项“其他”),根据限选三项、并依重要性排序的调查统计结果,在第一选择中,“保持社会稳定”高居榜首,58.9%的领导干部认为这是今后一段时期顺利推进改革的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这样高的认同率,是其他因素不可比的。综合前几年的调查数据,更说明了这一点。1999—2002年,选择“保持社会稳定”为顺利推进改革的第一位决定性因素的人所占比例,依次是46.7%、50.8%、54.9%和57.9%,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在第一选择中,列第2~4位的因素依次是:“强化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21.5%)、“缓解一些突出的矛盾(如失业、犯罪、腐败)”(6.5%)、“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4.7%)。这一排序与前两年是完全一致的。

表1 顺利推进改革的决定性因素(%)

决定性因素	第一选择	第二选择	第三选择	合计
1.保持社会稳定	58.9	11.2	9.3	79.4
2.强化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21.5	30.8	8.4	60.7
3.改善经济环境	1.9	8.4	6.5	16.8
4.疏导民意	1.9	8.4	6.5	16.8
5.坚持宏观调控方针	1.9	2.8	5.6	10.3
6.维护中央行政权威	1.9	6.5	7.5	15.9
7.缓解一些突出的矛盾	6.5	16.8	20.6	43.9
8.颁布和严格执行相应的法律法规	0.9	6.5	11.2	18.6
9.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	4.7	6.5	17.8	29.0
10.妥善处理国际关系	—	1.9	5.6	7.5
11.其他	—	—	0.9	0.9

三项选择合计结果的排序,与第一选择因素的排序完全一致。这种一致性,是多年来从未出现过的。

五、处理好党政关系是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效的决定性因素

领导干部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效的决定性因素的判断。问卷列出了10个封闭式选项和1个开放式选项(“其他”),第一选择因素的排序依次是:“处理好党政关系”(29.0%)、“进



一步转换行政机构职能(24.3%)、“扩大党内民主”(20.6%)、“提升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9.3%)、“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4.7%)、“精简党的机构”(4.7%)、“严格推行干部任期制”(3.7%)、“强化舆论监督”(2.8%)和“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作用”(0.9%)。两项选择合计结果的排序出现了一点变化。主要是在第一选择因素中列第2位的“进一步转换行政机构职能”,在两项选择合计结果的排序中下降到了第3位,而在第一选择因素中列第3位的“扩大党内民主”,在两项选择合计结果的排序中则上升到了第2位。“处理好党政关系”,则在两种排序中均稳居首位。

六、推进工资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阻力明显小于其他方面改革

任何一项改革,都涉及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当然也包括领导干部的个人切身利益。领导干部作为我国改革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改革对他们个人切身利益的影响及其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必然会反过来影响他们对改革的看法、态度和积极性,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成败。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多年来一直关注着领导干部对改革与个人利益关系的看法。

问卷列出的10个方面改革,均有超过30%的领导干部认为对自己“会有好处”,其中79.4%的人认为“工资改革”对自己会有好处,居第1位。超过60%的人认为对自己会有好处的改革还有“政治改革”(60.7%)。超过50%的人认为对自己会有好处的改革有:“教育科技改革”(57%)、“社会养老改革”(57%)、“机构人事改革”(56.1%)。位列其后的依次是:“住房改革”(46.7%)、“企业改革”(33.6%)、“医疗改革”(32.7%)、“劳动就业改革”(31.8%)和“金融改革”(30.8%)。使领导干部个人“会有损失”的改革,则主要是“医疗改革”(41.1%)、“住房改革”(22.4%)和“社会养老改革”(20.6%)。特别是前者。因为改革与个人利益关系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领导干部中对各方面改革究竟会使自己有好处还是有损失,“说不清”的情况还比较多,比如“企业改革”(56.1%)、“劳动就业改革”(55.1%),过半数的领导干部就说不清楚对自己有好处还是有损失。

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人心稳定是社会稳定的主要标志

改革发展稳定是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如前所述,保持社会稳定是今后一段时期顺利推进改革的首位决定性因素,稳定也是实现中国发展战略目标的首要因素。那么,领导干部又是怎样判断社会是否稳定呢,或者说,判断社会稳定与否的主要标准是什么呢?调查结果详见表



2。

同往年一样,问卷仍然是提供8个判断标准,由被调查者选择出自己判断社会是否稳定的两个主要标准,并依重要性排出顺序。在第一选择中,“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被49.5%的人选中,成为他们判断社会稳定的最主要标准。在所列各主要标准中,只有这一项的选中率接近50%。其他主要判断标准依次是:“人心稳定”(26.2%)、“政治稳定”(15.0%)、“治安秩序稳定”(4.7%)。这一排序与两项选择合计结果的排序是几乎一致的,与历年的调查结果也基本一致。

表2 判断社会稳定与否的最主要标志(%)

1.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49.5	19.6	69.1
2.人心稳定	26.2	22.4	48.6
3.领导班子稳定	1.9	0.9	2.8
4.物价稳定	0.9	2.8	3.7
5.治安秩序稳定	4.7	13.1	17.8
6.政治稳定	15.0	20.6	35.6
7.生活水平稳定	0.9	17.8	18.7
8.就业稳定	0.9	1.9	2.8

八、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加快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和惩治腐败,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主要条件

问卷列出了12个选项,由被调查的领导干部从中选出保持社会稳定的三个主要条件,并依重要性排序,调查结果见表3。在第一选择中,“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以68.2%的选中率遥遥领先,居第1位;“加快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8.4%)居第2位;“解决失业下岗问题”(4.7%)和“惩治腐败”(4.7%)并列第3位;“减轻农民负担”(2.8%)、“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2.8%)和“调节收入差距”(2.8%)并列第4位。从三项选择合计结果看,前三位仍然依次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76.6%)、“加快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43%)和“惩治腐败”(28.1%)。此外,“调节收入差距”(27.1%)、“解决失业下岗问题”(26.1%)、“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24.3%)和“减轻农民负担”(22.4%)均有超过15%的人认为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对保持社会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表3 保持社会稳定的主要条件(%)

排 序 主 要 条 件	第一选择	第二选择	第三选择	合计
1.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68.2	2.8	5.6	76.6
2.加快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	8.4	29.9	4.7	43.0
3.解决失业下岗问题	4.7	9.3	12.1	26.1
4.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	3.7	1.9	5.6
5.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	2.8	11.2	10.3	24.3
6.减轻农民负担	2.8	10.3	9.3	22.4
7.整顿社会治安秩序	0.9	5.6	6.5	13.0
8.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3.7	2.8	7.5	14.0
9.调节收入分配	2.8	10.3	14.0	27.1
10.惩治腐败	4.7	8.4	15.0	28.1
11.缩小地区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	0.9	5.6	11.2	17.7
12.合理疏导流动民工	—	—	—	—
13.妥善处理土地纠纷问题	—	—	1.9	1.9

(青连斌、周斌、刘海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5 ,1)

社会规划需要注意十大关系

眼下 ,各级政府正在加紧研究、制定各自的第十一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2020年远景目标纲要。科学地制定影响未来社会发展的政策、规划和措施 ,要正确处理好十大关系。

关系之一 社会事业与社会发展 根据当前政府转变职能和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需要 ,发展社会事业成为社会发展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基本内容 ,这对于扭转部分社会事业产业化造成的不良影响是有积极意义的。



社会事业并不能覆盖社会发展全部。在我国,社会事业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但社会事业远远不能覆盖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全部内容。

社会发展是以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为载体,通过有力的政府行为、公众的积极参与以及有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实施一系列社会政策来实现社会进步的过程。广义的“社会发展”概念涵盖了人类发展的各个领域,包括各社会系统的协调运行,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全面发展而进行的各种实践活动等。

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把消除贫困、公平分配、大众参与、生态保护、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等多种社会价值作为发展目标。狭义的社会发展主要注重体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把社会发展看作是推进社会公平与公正。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认为,社会发展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的目标:保护不利群体和脆弱群体;扩展并提高就业机会;建立社会安全网。

不论从广义还是从狭义来分析,社会事业都不足以囊括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要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仅仅依靠发展社会事业是不够的,必须以社会事业为依托,通过公众和企业的积极参与,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

关系之二: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与社会全面进步 在我国管理部门,通常用经济尺度来理解就业。从行业、产业、劳动生产率、工资增长以及产业结构等指标来分析和观察就业问题。但就业涉及平等和公正,又显示出其社会尺度。例如,当就业过程中出现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种族歧视以及由于失业造成社会差距拉大和贫困时,就需要用社会尺度对就业进行度量,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

收入分配也是如此。第一次分配属于经济范畴,第二次,特别是第三次分配主要体现社会公平与公正,应当被视为社会尺度。由于收入分配造成的社会贫困更是属于社会范畴。

社会保障是指当社会成员因为年老、疾病、失业、生育、死亡、灾害等原因致使生活困难时,能够从国家、社会获得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它比就业和收入分配更能体现其社会尺度,因为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通过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依法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给予保障而建立的一种安全制度。

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出发,我们研究就业、收入分配



和社会保障,不仅要以效益为尺度,也要以公平和公正为尺度,一方面要通过扩大教育和科技进步最大限度提高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可能使全体劳动者和全体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关系之三:共同社会价值与社会发展 社会的全面进步还意味着社会需要有与社会发展目标相适应的共同价值体系。

社会管理不能仅仅靠制度。制度仅仅制约人们的行为,而不能制约人们的心灵。没有心灵约束的社会是不健全的社会。人的信念、信仰、理想的一大特殊功能,就在于它们总是成为人们心目中价值判断的“尺度”,用以评量好坏得失,权衡长短轻重,使人确定自己行为的方向、态度和方式。人们总是尽可能按照自己的共同价值去生活,有什么样的共同价值就有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和行为取向。

共同价值是指人们关于自身发展和对待周围发展的观念系统,是人们在处理发展方向问题、特别是那些普遍性发展问题上,所持的相同立场、观点、态度的总和。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内心深处究竟相信什么、需要和想要什么、坚持和追求什么,构成了共同价值所特有的思想内容。和谐社会作为一个社会理想,之所以引起社会大众的强烈共鸣,是因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处始终是人类文化的核心。“中国人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中国人关心人与人之间如何共处的问题。”

国家和社会一定有自己的主导共同价值,构成这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价值基础。一个社会的主导共同价值构成它所特有的文化、文明的精神实质和显著标志,是这个国家和社会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也是社会决策的动机和目的之所在。正因为如此,共同价值在社会发展中往往占有核心和基础的地位。

在当前社会发展规划中,我们必须把共同价值建设放在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而且,这是中国社会建设中一项长期的任务。

关系之四:公共服务型政府与社会管理体制 所谓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是以人为本,为全社会服务,让政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提供良好的公共政策服务和制度供给的组织。公共性、公共精神是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和现实表现形式。而公共精神既包括平等也包括参与。

公共服务从功能方面可以分为三大类:维护公共服务,如国家安全、行政管理和国防外交等;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公共服务,如政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等;社会性公共服务,如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科技、环保等。